

唐史學會論文集



## 目 录

- 唐代士族及其衰落·····吴宗国(1)
- 简论唐代山东旧士族·····李光霁(25)
- 唐前期三次官修谱牒浅析·····邓文宽(45)
- 关于唐代门阀士族势力消长问题的考察·····田廷柱(68)
- 门阀制度瓦解原因新探·····张 邻(84)
- 试析玄武门事变的背景内幕·····胡 戟 胡 乐(97)
- 魏徵前后上谏二百多次说辩·····关大虹(126)
- 关于唐玄宗李隆基的几个问题·····袁英光 王界云(129)
- 杜甫两过昭陵与“安史之乱”·····孙 迟(155)
- 《旧唐书》中关于元和三年对策案的矛盾记载·····唐长孺(167)
- 辨李德裕与宦官之关系·····王炎平(176)
- 唐代后期的宦官世家·····陈仲安(195)
- 略论唐代科举制度的不成熟性·····张邦炜(225)
- 肃代之际的江淮和大历财政改革·····周殿杰(235)
- 唐代两税法实行后的两个突出问题·····赵和平(259)
- 试论唐代后期的和籴制度·····杨际平(278)
- 隋唐五代农民起义与宗教及儒家的关系·····李斌城(297)

附录:

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吴 枫(325)

# 唐代士族及其衰落

吴宗国

## 一、关于山东士族

唐代士族问题，主要是山东士族和关陇贵族问题。江南士族则早已衰落，到隋和唐初，已经完全成为关陇贵族的附庸。

我们这里所说的山东士族，实际上是指魏晋以后，特别是北魏孝文帝定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的姓族等级以后的山东士族，亦即《新唐书》卷一九九《儒学传·柳冲传》中柳芳所说的山东郡姓。因为在这以前，河北地区的许多强宗豪右还没有列入士族范围，没有门阀等第。在这以后，他们才列入士族。

士族门阀是随着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从两汉发展而来。东汉已经出现了大姓、著姓、冠族，并开始垄断政权。汉朝原来实行辟举制度，就是由中央各部门和州郡长官特聘士人担任属官，由郡国举孝廉，每二十万人举一人到朝廷，考试合格后授给官职。这原来是从一般地主中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但从东汉中叶起，就改变了“前世举人贡士，或起畎亩，不系阀阅”<sup>①</sup>的情况，开始“选士而论族姓阀阅”<sup>②</sup>。门第阀阅往往成为做官的先决条件。豪强世族并利用辟举制度，世代担任州

①《后汉书》卷三《章帝纪》建初元年诏。

②马总《意林》载仲长统《昌言》。

主簿、郡功曹等地方佐官，掌握地方实权，直接控制地方行政。但这些在当时都还没有制度化，门阀等级也没有固定下来。

士族门阀制度，是在魏晋时形成的。魏晋时期，在黄巾起义中受到沉重打击的士族门阀逐步恢复了自己的力量。同时，又兴起了一些新的门阀。这些新起的门阀，不是两汉以来的大姓阀阅，有些甚至出身卑微，但由于他们在魏晋间获得较高的官位，故得列于士族。不论是旧有的还是新起的，他们都要求用制度把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和政治经济特权固定下来。因此，在魏晋时期，主要是在西晋，形成了门阀制度，这就是九品中正制和品官占田荫客制（或叫占田制、荫族制）。这两个制度从法律上确定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等级关系和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的世袭特权。此后，即西晋以后，门阀等级空前森严，婚宦都严格地在一定等级范围内进行，士族制度已经走到了它的顶点。另外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即在魏晋时，河北缺少士族，除崔、卢等少数家族外，其余均未列入士族<sup>①</sup>。

西晋末年，少数民族进入内地，河南、山东等地最大的士族跑到江南，成为侨姓士族（王、谢、袁、萧）。他们与孙吴时期发展起来的吴姓士族（朱、张、顾、陆）相结合，构成了东晋的最高统治集团。这两个士族集团范围很窄，后来很少有什么变化。

十六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轮番进入河北中原地区，原有的封建政权系统被破坏，聚族而居的豪强大族包括旧有的士

<sup>①</sup>唐长孺《门阀的形成及其衰落》，载《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9年第8期；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第四章第一节。

族，除了自己的佃客、部曲，还有许多农民（即苞荫户）投靠以求保护。豪宗强族把他们组织起来，保据乡土，成为堡坞主、宗主，各自控制一方。北魏统治者进入北方后，为了换取他们的支持，承认他们割据一方的权力，称为宗主督护。但对原来的士族门阀等级则没有触动。

直到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才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重订士族门阀。他一方面让鲜卑贵族门阀化，使他们和汉族士族处于同等地位。共有八氏十姓（帝宗）、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号部落大人），改籍河南洛阳，号河南洛阳人。同时，打破魏晋士族壁垒，把地方上的豪宗强族都编入士族，叫做郡姓，并按照祖先官位高低，划为四等（甲、乙、丙、丁）。“凡三世有三公者为膏粱，有令、仆者为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得入者，谓之四姓。”<sup>①</sup>唐人柳芳所云“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卢、崔、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其中除了侨姓、吴姓士族外，其他山东郡姓、关中郡姓、代北虏姓，大体上都是在这个时期最后确定下来的。

承认原来没有列入士族的河北、山东的豪宗强族为郡姓，扩大士族范围，这一方面是鲜卑统治者要拉拢汉族地主，组成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封建统治集团，以加强

<sup>①</sup>《新唐书》卷一九九《儒学·柳冲传》。唐长孺《门阀的形成及其衰落》。

对河北中原地区的统治。同时也表明，至少在此前一段时期内，士族等级不是那么森严的，它不象西晋以后那样牢不可破，不可更动。这是一种迹象，说明士族地主和门阀制度已经开始衰落。

北魏末年，爆发了六镇、河北、关陇人民大起义，起义的中心地区是士族集中的河北、山东。在起义过程中，许多佃客、部曲摆脱了豪强士族的控制，许多地主庄园被起义军攻破，还有许多士族地主被驱逐出境。例如殷州（河北隆尧）的士族大地主李元忠，控制宗族宾客数千家，统治了殷州李鱼川五、六十里的地方。葛荣起义后，李元忠率宗党负隅顽抗，庄园中一些农民站在起义军一边，他前后斩违命者达三百人，最后葛荣攻破庄园，李元忠也做了俘虏<sup>①</sup>。又如右北平（河北遵化）士族阳休之，初为州主簿，杜洛周起义军攻陷蓟（北京），阳休之与其宗族一逃章武（河北大城、天津、沧州之间），再逃青州（山东益都）。后来葛荣在河北起义，他自知民愤很大，不为河北农民所容，又逃到洛阳<sup>②</sup>。象阳休之这样逃离本乡的士族地主，虽然可以凭借原有的社会政治地位，跑到中央和外地做官，但由于远离故土，丧失了原来世代传袭，历久不衰，独霸本乡，直接控制本地政权的权力，力量被大大削弱<sup>③</sup>。

这样，经过农民战争的打击，到东魏、北齐时期，士族地主就更加衰落了，他们已经无力抵抗高齐的打击。高欢、高洋

---

① 《北史》卷三三《李灵传附元忠传》。

② 《北史》卷四七《阳尼传附休之传》。

③ 《中国古代史讲义（试用稿）》上册第五章第三节三，田余庆执笔，北京大学历史系，1973。

父子是鲜卑化汉人，他们主要依靠六镇和鲜卑贵族，而对山东士族则采取既拉拢、依靠，又抑制、打击的政策。北齐建立后不久，文宣帝高洋对于那些在农民战争中“鸠率乡部，托迹勤王，规自署置”<sup>①</sup>，占有一小块地方就自命为郡守、县令的士族豪强，通过并省州县（省去三州、一百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县、二镇、二十六戍），取消了他们称霸一方的政治权力。对羊、毕诸豪，即一些第二等的高门，并采取了强制迁徙的办法<sup>②</sup>。这些做法，大体上还只是一种抑制。到后主高纬统治时期，连在朝廷中颇有声望，影响到六镇鲜卑贵族地位的博陵高门崔季舒、渤海大族封孝琰等，因联名谏止后主去晋阳，也被斩于殿庭。这就完全是一种公开的打击了。而对于高氏政权的这些打击，山东士族已经完全无力抵抗<sup>③</sup>。

山东郡姓在地方上的势力也进一步被削弱。北齐后主“赐诸佞幸卖官，……下逮乡官，亦多降中旨。故有勅用州主簿，勅用郡功曹”<sup>④</sup>。州主簿、郡功曹自汉以来由长官辟举，东汉以后逐步为豪强大族垄断，最后成为士族豪强直接控制地方政权的工具。因此，勅用州主簿、郡功曹不仅是剥夺了地方长官的辟举权，而且是剥夺了士族豪强直接控制地方政权的特权。虽然没有明令停止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还不能说取消了士族的这种传统特权，但毕竟是一种迹象，说明山东士族在地方上的力量已经大大削弱了。山东士族从经济上、政治上，都已经衰落了。

① 《北齐书》卷四《文宣纪》，天保七年诏。

② 《通典》卷三《乡党》。

③ 《北史》卷三二《崔季舒传》。

④ 《北史》卷八《齐本纪下·后主纪》。



但山东士族的衰落也不是直线下降的，其间还是有一些起伏，特别是原来门第较低的三、四等士族，在农民战争中所受打击较小。“至若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类，一宗将近万室，烟火连结，比屋而居。”<sup>①</sup>

士族地主，主要是山东士族发展和衰落的过程大体就是这样，至于衰落的原因，汪篔先生在《关于农民的阶级斗争在封建社会中的历史作用问题》<sup>②</sup>一文中已作了精辟的论述，兹不赘述。

最后需要说明，本节所述，主要是根据唐长孺、汪篔、田余庆诸先生的有关论著以及他们的讲授和报告，并参考了范文澜和王仲荦先生的意见写成的，有些地方简直就是照抄原文。目的是要对唐代山东士族的情况作一个适当的估计，作为讨论其他问题的依据。

## 二、关于关陇集团

经过农民阶级斗争的不断打击和朝代的变换，山东士族中第一等高门崔、卢、李、郑，第二等高门羊、毕、封、高都一批批垮了下去，即使在北齐还有一定实力的刘、张、宋、王、侯诸族，到隋代也没有多少力量了。燕荣为幽州总管，“范阳卢氏，代为著姓，荣皆署为吏卒，以屈辱之。鞭笞左右，动至千数。”<sup>③</sup>山东士族衰微的程度，于此可见一斑。

正在发展中的山东一般地主，还没有形成为一股强大的势

①《通典》卷三引宋孝王《关东风俗传》。

②见《汪篔隋唐史论稿》。

③《隋书》卷七四《燕荣传》。

力，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去独掌政权，甚至进入各级政权的人也很少。他们中的一些人士，在隋代还不过是令史小吏（张玄素、孙伏伽）、里长（窦建德），做到州县官的也只有翟让等为数不多的一些人<sup>①</sup>。

在上述情况下，隋朝是由关陇军事贵族联合出身山东的个别人物来进行统治。这些个别人物，如高颎、李德林，不是山东士族，也不是一般地主，而是北魏以来官僚的后代。他们都没有去维护士族地主的政治经济特权。相反地，个别维护士族门阀利益的官僚倒是受到了排斥和惩办。如卢恺，开皇九年擢吏部尚书，“与薛道衡、陆彦师等甄别士流，故涉党固之潜”<sup>②</sup>以致得罪，被除名。

隋朝政权的最高统治权尽管是掌握在关陇贵族手中，而从隋末山东、河北一带的农民起义军“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sup>③</sup>来看，地方官中士族子弟也仍然占据着一定的数量。但是，由于山东士族和江南士族都已经衰落，这个政权只可能是建立在一般地主的阶级基础之上。隋政权废除九品中正制，实行地方佐官由中央任免的制度，取消了士族地主世袭做官、世代控制地方行政的特权。这固然是从关陇贵族与山东士族这两个地主阶级内部不同的阶层和集团的矛盾出发的，而实际上则是把山东士族从北魏以来，特别是由于历次农民战争的打击而失去的特权，用法律形式予以废除。这样做的结果，又进一

---

① 《旧唐书》卷五四《窦建德传》，卷七十五《孙伏伽传》；《资治通鉴》卷一八三大业十二年十月李密之亡条，卷一九五贞观十四年十二月玄素少为刑部令史条。

② 《隋书》卷五六《卢恺传》。

③ 《资治通鉴》卷一八三大业十二年十二月郭绚讨高士达条。

步促进了士族地主的衰落。从根本上来说，隋政权这些措施适应了一般地主的要求。

唐初的政权，也是由关陇贵族联合其他阶层进行统治。不同的是，隋文帝时只是从出身山东的官僚中找出个别人物协同关陇贵族成员来实行各项改革，而在唐高祖时，除了重用关陇贵族，还重用了山东士族和江南贵族中的一些人。

高祖时十二个宰相，除了李世民和李元吉，其余十人中，出身于关陇贵族集团的七人：裴寂、萧瑀、窦威、窦抗、杨恭仁、宇文士及和刘文静。除刘文静外，都出身于显贵的家族，其中窦威、窦抗、萧瑀和宇文士及都是隋唐皇室的亲戚。另外三人：封伦即封德彝是山东士族，陈叔达是江南贵族，裴矩是齐隋旧臣。

这种情况说明，唐初建立起来的统治，依然是门阀士族的统治，关陇贵族仍然是统治的核心。但从这些人担任宰相的实际情况来看，刘文静于武德元年（618）六月任纳言（侍中），七月即因败于薛举而被除名，前后不过一个月。窦威，虽然高祖对他甚为倚重，可是只做了28天宰相，就去世了。高祖以其族侄窦抗继为宰相，但由于他不能参知政务，只能陪侍游宴，所以也只做了四个月，在十月就罢为左武侯大将军了。裴矩和宇文士及都是很晚才担任宰相的（武德七年和八年），担任的时间也只有一年左右。至于杨恭仁，是遥领，他主要担任凉州总管，镇守西方边陲，并不是真正的宰相。

由此可见，武德时期长期担任宰相并执掌政务的是裴寂、萧瑀、封伦和陈叔达四人。这种情况说明，在唐初实际政务的处理中，山东士族和江南贵族还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关陇贵族所起的作用，是远远没有他们所处的地位和先后担任宰相的人

数那么大的。这种情况可以从关陇军事贵族的历史弱点，唐政权当时所面临的客观情况和唐朝最高统治者的门阀观念几个方面来加以说明。

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是以西魏、北周以来的六镇鲜卑贵族为主体，联合关陇汉族地主（关中郡姓），凭借武力而建立起来的一个统治集团。尽管从隋朝开始，这个集团的主体就转变为汉族官僚，但也没有改变这个集团的以下特点：

第一，这个集团的家族不可能是很多的。他们大多是通过武功进入这个集团，并依靠高官厚禄来维持他们的地位，在社会中没有深厚的根基和广泛的联系，家族一般也不如山东士族那样庞大。因此，虽然经过周隋以来八、九十年的经营，但经过周隋和隋唐两次朝代的更替，特别是经过隋末农民战争，这个集团所受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武德元年六月，李渊即位不久就在诏令中谈道：“近世以来，时运迁革，前代亲族，莫不诛夷。”<sup>①</sup>因此，到唐初关陇贵族的核心家族已经不多，而且很多还是因为是皇室的亲戚，才得以继续存在。如宇文述及本身为隋炀帝女婿，女为唐高祖昭容；窦威、窦抗为高祖妻家，长孙无忌为李世民妻兄。

第二，尚武的风气。柳芳论氏族曾经谈到：“关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达可与也；代北之人武，故尚贵戚，其泰可与也。”<sup>②</sup>这是就当时风气而论，其实主要就是因为这个集团的政治权势是依靠武力得来的，因此其成员普遍崇尚武艺，军功成为这个集团仕进的主要途径。窦威、窦抗的家族在当时便

<sup>①</sup> 《资治通鉴》卷一八五。

<sup>②</sup> 《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

是一个典型。

窦威，他的先世在西魏、北周均为第一等高门，父焜入隋后拜太傅，“威家世勋贵，诸昆弟并尚武艺，而威耽玩文史，介然自守。诸兄哂之，谓为书痴。”守秘书郎十余年“学业益广，时诸兄并以军功致仕通显，交结豪贵，宾客盈门，而威职掌闲散”。诸兄笑他“名位不达，固其宜矣”，说他活该。当时关陇贵族的子弟大多如窦威昆弟，习尚武艺，能骑射征战，但对治理国事，却并不在行。虽然也出现了窦威那样“博物，多识旧仪，朝章国典，皆其所定，禅代文翰，多参予焉”的人，但只是个别的<sup>①</sup>。至于萧瑀，本源江南，是后梁的嫡支，他的家族很早就依附了北周。入隋后，他的姐姐做了炀帝皇后，自己做了独孤氏的女婿，因而才成为关陇贵族集团的重要人物。太宗时发挥重要作用的长孙无忌，也是从小受其舅高士廉抚养，接受了他的影响。这几个都是特殊的例外。虽然从隋开始，一些人也进学校，但还没有蔚成风气。因此，这个集团的一些人虽列位宰相，却不能担负宰相的工作，宇文士及、窦抗都是这样的人物。

总之，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本身成员本即不多，加以尚武的风气，能够经世治国的人更少。因此，西魏、北周以来，必然要吸收山东士族和江南贵族来进行统治。特别是唐建立后，需要建立一整套典章制度，他们就更是成为不可缺少的人物。陈叔达，以及具有江南贵族和关陇贵族双重身分的萧瑀，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挥他们的作用的。

---

<sup>①</sup> 《旧唐书》卷六一《窦威传》。

唐在关中建国后，面临着东方的复杂情况，那里不仅是山东士族的根据地，而且也是农民起义的中心地区。在尚存的三个武装集团中，除盘踞东都的王世充外，河北的窦建德和江淮的杜伏威，都是通过农民起义建立起来的政权，在这个地区都有着深厚的影响。因此，除了在军事上压服，如何在政治上巩固对这个地区的控制，便成为唐政权的一个主要问题。

武德元年九月，李密被王世充打败，率众入关降唐，唐派往山东的安抚大使是淮安王神通，副使是山东士族黄门侍郎崔民干。其目的，正如胡三省在通鉴注中所云：“崔民干，山东望族，故使副神通以招抚诸郡县。”<sup>①</sup>

武德二年四月，在宇文化及已被窦建德擒去，山东郡县和农民军相继降唐的情况下，又遣大理卿郎楚之安抚山东。郎楚之是定州新乐人，在隋大业时即因与朝廷中山东人“自作门户，更相刻荐，附下罔上，共为朋党”而被流配到漫头、赤水<sup>②</sup>，在山东士族中是有影响的人物。派他同样是为了利用他的身分和威望。但这次和上次崔民干一样，都是副使，而且都是招抚性质。

武德四年（621）五月窦建德被俘后，立即以太子左庶子郑善果为山东道抚慰大使，并使就洛州选补山东州县官。郑善果的先世都在西魏、北周做官，父亲是在平尉迟迥时遇害而死的，善果九岁即袭其父大将军、开封县公官爵。但他出自蒙阳郑氏，并其母崔氏，都是山东第一等高门。他本人在隋代做过沂州刺史和鲁郡太守<sup>③</sup>，和山东士族的联系是很密切的，正是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六武德元年十月庚辰条。

② 《旧唐书》卷七五《韦云起传》。

③ 《旧唐书》卷六二《郑善果传》。

由于他这种一身而二任的身分，李渊才赋予他到山东选补官吏，重建地方政权的重任。

以上情况说明，武德时期，唐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山东士族去解决山东问题的，因而在中央决策机关中作为山东士族代表的封伦（德彝）就具有很大的重要性。武德六年，他又以本官兼吏部尚书，更说明山东士人在唐政府中占有的重要地位。

尽管高祖李渊想联合山东士族、江南贵族进行统治，并利用山东士族去解决山东问题，但由于山东士族在唐初更加衰落，除了被镇压和逃散的，其余的也是“身未免于贫贱”<sup>①</sup>。加之他们对农民的仇视和疑惧，因而不可能采取恰当的政策和做法。唐政权在山东刚选补了州县官，把政权的架子搭起来，就开始了对农民的反攻倒算，结果闹出了大乱子，引起了刘黑闥起义。

恰恰在这个时期，山东豪杰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出身于山东的魏徵协助李建成平定刘黑闥起义，或者还可看成是一种个人的行为。而在李建成、李世民皇位争夺的斗争中，山东豪杰就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李建成请求率兵征讨刘黑闥，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魏徵建议他借此“结纳山东豪杰”<sup>②</sup>。玄武门事变后，河北一带出现了“素事隐巢者不自安，往往曹伏思乱”<sup>③</sup>的情况，也说明此行是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而与此同时，李世民也命张亮去洛阳，“阴引山东豪杰以俟变”<sup>④</sup>。

① 《唐会要》卷八三《嫁娶》。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〇武德五年十一月。

③ 《新唐书》卷九七《魏征传》。

④ 《旧唐书》卷六九《张亮传》。

对山东豪杰有各种不同的理解。但“以农为业”这一点，不仅为史料所证明，亦为各家所承认<sup>①</sup>。翟让曰：“仆起陇亩之间。”<sup>②</sup>李勣也曾说：“我山东一田夫耳。”<sup>③</sup>稍后登上相位的魏征，虽然“不事生业，出家为道士，好读书”，但也被太宗称为“田舍汉”<sup>④</sup>。翟让原为东郡法曹<sup>⑤</sup>，李勣家多童仆，积粟数千钟；魏徵父原为县令，自然都不是农民。故山东豪杰实为在隋末迅速兴起的山东一般地主中的豪杰。在武德、贞观之际，他们已经成长为一支对政局具有巨大影响的力量。

因此，唐太宗即位后，重用的大臣中，有相当多数量的山东一般地主出身的官吏。宰相二十八人中，有六人是高祖时的旧相，可略而不论。在太宗自己任用的二十二人中，关陇贵族出身或与关陇贵族有密切关系的有高士廉、长孙无忌、李靖、杜淹、杜如晦、杨师道和侯君集等七人，而出身于山东一般地主家庭的有魏徵、温彦博、戴胄、李勣、张亮、马周、张行成等七人。此外，在出自南朝名臣之后的五人中，岑文本、刘洎和王珪，在政治上和山东一般地主也是完全一致的<sup>⑥</sup>。在唐太宗重用的来自山东和江南的大臣中，魏徵帮助唐太宗确定了贞观治国方针，唐太宗也承认他是“与吾共安天下”的功臣。马周和刘洎在保证贞观中、后期的政治沿着贞观初年的轨道继续前进上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①陈寅恪《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金明馆丛稿初编》）。

②《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

③《旧唐书》卷六七《李勣传》。

④《隋唐嘉话》上。

⑤《资治通鉴》卷一八三大业十二年十月李密之亡条注。

⑥汪篾《唐太宗之拔擢山东微族与各集团人士之并进》（《汪篾隋唐史论稿》）。



一般地主出身的大臣，尽管在统治方针政策的制定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他们在最高统治集团中，还只是处于被重用而不是核心的地位。

贞观时期，处于整个统治集团核心的还是关陇贵族。唐初皇室的王妃、主婿皆娶自勋贵名臣家，目的是以此来加强皇室和大臣之间的联系。就尚主而论，连降附的突厥酋长执失思力、阿史那社尔、史仁表和凭军功起家的程知节之子，都包括在内，而唯独没有山东一般地主出身的大臣的子弟<sup>①</sup>。在皇位继承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的也是长孙无忌等关陇贵族成员。这样就造成了太宗时期在用人上的一个显著特点，即依靠力量和使用力量的分离，统治核心和统治机构办事大臣分离。因此，我们不能以贞观时宰相中关陇贵族人数较少而否认关陇贵族在唐初的存在及其在政治上的作用。

由于封建王朝是地主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而皇权又是封建政权的集中表现，因此，正处在迅速发展阶段的一般地主官僚也是十分关心皇位继承问题和最高政权机构成员的构成的。魏徵不仅积极维护太子承乾的地位，而且推荐杜正伦、侯君集为宰相以分掌军政大权。刘洎、岑文本也支持魏王泰继为皇太子。而这又必然引起将此视为自己专有领域的关陇贵族的嫉恨，也引起了太宗的猜忌。所以在所谓承乾谋反事发后，太宗推倒自己亲自撰写的魏徵碑。晋王治被立为太子后，太宗对岑文本、刘洎的猜忌与日俱增。两年后，岑文本死去，刘洎也被借故杀掉<sup>②</sup>。

---

①汪篋《唐太宗树立新门阀的意图》（《汪篋隋唐史论稿》）。

②汪篋《唐太宗》，载《汪篋隋唐史论稿》。